

# 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 「八月事件」序曲

• 沈志華

**摘要：**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及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對金日成在朝鮮的統治產生了負面影響，從而遭到朝鮮勞動黨的抵制。但勞動黨內部對金日成不滿的幹部受到「非斯大林化」的刺激和鼓勵，趁金夏天出訪蘇聯、東歐及蒙古之際紛紛串聯，形成反對派，準備通過政治鬥爭的方式批判金，並希望得到蘇共的支持。對於勞動黨在三大前後的表現，蘇聯各機構都非常不滿，對朝鮮黨內反對派的意見有所支持，蘇聯領導人亦對金日成施加了一些壓力。反對派主要由「延安派」人士推動，為獲得莫斯科的明確支持，反對派沒有採取進一步的實質性行動，但他們的主要目標是更換朝鮮黨和政府的領導層，甚至包括金日成本人，而理由就集中在個人崇拜問題上。這是金日成的軟肋，也最能夠打動蘇聯人。

**關鍵詞：**金日成 蘇共二十大 朝鮮勞動黨三大 「非斯大林化」 「八月事件」

1956年發生的朝鮮勞動黨（簡稱勞動黨）「八月事件」長期不為人知，究其原因，一則當時危機很快就平息下來，沒有造成重大影響；二則事後各方都對此緘默不語，很少對外人談起；三則有關的檔案文獻一直密封封存，研究者很難了解實情。實際上，這次事件在勞動黨歷史和中朝關係史中都是一件大事，甚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也是值得書寫一筆的<sup>①</sup>。1956年2月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蘇共二十大）的召開，特別是赫魯曉夫（Н. С. Хрущев）推動的「非斯大林化」運動，引發了195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陣營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場大動盪，隨後發生的1956年「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1957年中國的「反右運動」和蘇聯的「反黨集團事件」，都對所在國的政治社會發展道路及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產生了極大影響。同期在朝鮮發生的「八月事件」，就其對國內的震動特別是中朝關係的影響而言，絲毫不亞於上述歷史事件，而且從當時的情況看，更險些演變成一次東方的「匈牙利事件」。

## 一 「非斯大林化」與勞動黨三大

蘇共二十大因推出「非斯大林化」而聞名世界。赫魯曉夫首先在政治報告中提出要重建和加強「列寧主義的集體領導原則」，並嚴厲「譴責個人崇拜」，繼而召開秘密會議，親自做〈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長篇講演，史稱「赫魯曉夫秘密報告」。

歷史研究表明，對於斯大林（Й. В. Сталин）的批判，並非蘇共內部個人或小集團謀求權力的工具，而是要以此為鋪墊，改變斯大林以往的某些政策和做法，使蘇聯擺脫因冷戰爆發而造成的與西方關係的緊張狀態及內部發展困境。對斯大林的絕對崇拜是蘇聯社會變革不可逾越的鴻溝，蘇聯要擺脫危機，必須破除個人崇拜的羅網。這是蘇共中央集體的決定，分歧只在於問題的提法和批判的程度。囿於認識能力和傳統觀念，蘇共二十大並沒有從社會變革的層面提出改造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的根本任務，而僅限於政策性調整和某些具體措施的實施。赫魯曉夫正是利用傳統力量擊敗了政治對手，而他本人也受到傳統勢力的束縛。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新一代蘇聯領導人雖然在政治上還不成熟，缺乏經驗和智慧，但畢竟開始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問題。更準確地說，蘇共二十大為共產黨國家提供了一種改弦易轍的可能性，一個擺脫斯大林模式束縛的歷史機會。然而，赫魯曉夫的驚人之舉卻在共產主義世界引發了一場大地震。

儘管赫魯曉夫在報告中並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甚至還認為他是「最堅強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但長期以來的殘酷鎮壓手段和瘋狂造神運動已經使斯大林成為真理的化身。在斯大林受到全世界共產黨人頂禮膜拜的氛圍中，如此提出問題仍然具有極大的冒險性。當赫魯曉夫情緒激動地以激烈言辭批判斯大林的時候，所有在場的人都感到了從未經歷過的意外和震驚。會場的氣氛異常壓抑和緊張，甚至有人當場暈倒。「秘密報告」很快就傳達到蘇聯基層黨組織，並散發給各國共產黨中央。剎那間，一石激起千層浪，整個蘇聯社會和共產主義世界都震動了。批判個人崇拜和「非斯大林化」，就其影響而言，一方面，啟發和推動了各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們去思考社會主義道路究竟應該如何走下去；另一方面，也引發了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思想迷惘和疑惑、社會分裂和混亂。蘇聯格魯吉亞的群眾暴動、波蘭的波茲南罷工運動，以及震撼世界的「匈牙利事件」，都是赫魯曉夫批判個人崇拜和「非斯大林化」的結果②。

對於金日成來講，蘇共二十大的衝擊具有災難性。批判個人崇拜的消息不脛而走，而且與一些朝鮮黨內幹部及社會上知識份子的「思想火花」產生了碰撞，大家開始進一步思考朝鮮自己的問題③。金既沒有斯大林數十年領導革命的資歷，更沒有斯大林那樣萬眾追隨的威望，赫魯曉夫在蘇聯發起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簡直就像是在朝鮮拋出了一篇聲討金的檄文。這不僅僅是因為斯大林成就了金，也不僅僅是因為金把「斯大林萬歲」的口號喊得最響，最重要的是，幾年來，金完全是效仿斯大林的做法，在朝鮮大樹個人權

威，標榜自己，在黨內大開殺戒，排除異己。黨內「南方派」、「延安派」和「蘇聯派」（或稱「莫斯科派」）主要幹部相繼遭到清洗<sup>④</sup>。他的確得罪了很多人，在勞動黨幹部中積怨甚深。現在莫斯科號令批判個人崇拜，豈能不讓金萬分緊張。

其實，早在1955年針對蘇籍朝鮮幹部開展批判的時候，金日成就擔心受到莫斯科的干預，對蘇聯人避而遠之。可能是出於一種不祥的預感，他甚至在同年的政治委員會會議上否定了朴正愛的建議，以訪問東德為由拒絕率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大<sup>⑤</sup>。而後來出席蘇共二十大的蘇聯衛星國黨的代表團，除了朝鮮勞動黨，都是由第一把手率領的<sup>⑥</sup>。金已經意識到他與莫斯科之間有了一定距離。

蘇共二十大召開的時候，金日成在平壤如坐針氈。除了「秘密報告」，在大會的公開報告中，赫魯曉夫和米高揚（А. И. Микоян）也談到了個人崇拜問題，米高揚甚至點名批評斯大林的著作。中共中央機關報分別在1956年2月18和22日全文發表了這兩個文件<sup>⑦</sup>。金卻顯得十分謹慎。對於赫魯曉夫2月14日所作的政治報告，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聞》2月16日的摘編小心翼翼地去掉了「個人崇拜」和「集體領導」的用詞，而全文遲到23、24日才刊出。至於米高揚在大會的發言，《勞動新聞》在刊登的摘要中，特別刪去了有關對斯大林著作的評價<sup>⑧</sup>。對於蘇共二十大的精神及其文件，勞動黨無法封鎖，但如何向黨內傳達則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1956年3月20日，勞動黨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全會，中央各機構及各道黨委領導人全部參加。出席蘇共二十大的勞動黨代表團團長崔庸健做了三個小時的報告，傳達大會的內容和精神。代表團另一個成員李孝淳宣讀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翻譯文本。報告後只有三個人做了發言，即金日成、外務相南日和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李一卿。金的發言重點談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問題，他首先一般性地肯定了赫魯曉夫的報告：從這個報告可以看出，個人崇拜會導致多麼有害和危險的後果，每一名黨員都應該清楚這一點。然後在談到朝鮮的情況時，金又具體地否定了個人崇拜現象的存在。金說，勞動黨的原則是集體領導，卻閉口不提他長期將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長、內閣首相和最高總司令的職務集於一身；金說，關於集體領導，即使在困難的戰爭年代勞動黨都定期召開中央全會，卻閉口不提連續八年未召集黨代表大會，從1948年起便沒有舉行最高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從1946至1947年起再未舉行地方政權機關選舉；金說，中央政治委員會早就向全黨發出指示，在宣傳工作中應主要突出人民群眾的作用，而不是英雄人物的作用，卻閉口不提全國各地都豎立着他個人的紀念碑和肖像，報刊、電影、歌曲、演出無不充斥着對他個人的頌揚。說到個人崇拜，金強調，在朝鮮的一段時期和某些地方，的確存在着個人崇拜現象，那就是在南方對朴憲永強烈的個人崇拜，其後果就是妨礙了黨及時揭露他的反黨叛國罪行<sup>⑨</sup>。全會沒有進行任何討論，只是就崔庸健的報告做了一個不痛不癢的決議：「應該深入研究蘇共二十大的材料並把其豐富經驗創造性地運用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中央組織部和宣傳部應該做好政治組織工作，推廣對蘇共二十大材料的學習」<sup>⑩</sup>。



許嘉誼（許哥而，中）與金日成（右）。（資料圖片）

正是在這種口徑下，勞動黨各機關和基層組織開始宣傳和學習蘇共二十大的文件，其目的主要是淡化反個人崇拜和「非斯大林化」的影響。在1956年4月4日平壤市委為文化、出版和學術部門組織的講習班上，針對人們最感興趣的個人崇拜問題，黨委員長李松雲在報告中強調，勞動黨中央絲毫也沒有背離過馬列主義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黨內只有對朴憲永和許嘉誼（許哥而）的個人崇拜，正是這些宗派份子通過形式主義、教條主義，「將斯大林時期蘇聯的個人崇拜實踐移植到朝鮮的土壤上」。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韓相斗在報告中提出，今後大家提到金日成同志時，不要再用阿諛奉承的詞語，也不要再使用領袖的字眼，因為金對此一向不以為然。韓還解釋說，內閣的確做出過以金的名字命名平壤一個廣場的決議，但金本人事先對此毫不知情<sup>①</sup>。

同時，為了統一全黨的思想，勞動黨中央向黨內所有機構和組織下發一封秘密信件，專門講述有關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一些問題，其基調是「蘇共二十大所揭露的蘇共本身所具有的那些錯誤在朝鮮勞動黨的活動中並不佔有任何地位」。信中多次強調，集體領導原則是勞動黨在自身活動中所堅守的最高原則，勞動黨中央從來也沒有放棄過這一原則。關於蘇聯出現過的個人崇拜現象，在朝鮮只是與朴憲永有關。至於黨的思想工作中的缺陷，就是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信中特別激烈地抨擊了一些人迷信外國的奴性思想<sup>②</sup>。

金日成還在一次內閣會議上發表了兩個小時的激情演講，嚴厲指責文化部門在宣傳中忽視了朝鮮的民族特點，電影裏一味反映的都是蘇聯和其他外國的東西。金還譴責一些人懷疑黨的政策的正確性，胡說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閉眼不看朝鮮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這些成就是「社會主義陣營許多其他國家無法取得的」<sup>③</sup>。在此期間，朝鮮黨和政府想方設法封閉來自蘇聯的消息，消除蘇聯的影響，以避免「非斯大林化」的「瘟疫」傳播。根據中央的指示，撤銷了郡級朝蘇文化協會及其印刷廠；從各劇院的演出節目中取消了蘇聯藝術家的表演；蘇聯的朝鮮語廣播節目從每天四次減少到兩次；關閉以俄語專業為主的外語學院，將學生轉入金日成大學；所有大學縮減俄語授課的時間，而四至五年級學生的俄語課程則全部停止<sup>④</sup>。

金日成甚至想到了對朴憲永執行死刑的問題。朝鮮曾兩次向蘇聯國家安全總顧問了解蘇聯對執行朴的死刑問題的看法，大概是蘇方的答覆不明確或朝鮮人不滿意，1956年4月19日，金親自到蘇聯使館向駐朝大使伊萬諾夫(В. И. Иванов)詢問。伊萬諾夫解釋說，蘇聯檢察機關認為不應該執行對朴的死刑，理由是朴在政治上已經失敗，對他的宣判(1955年12月)也過去了很長時間，現在突然執行死刑，可能會引起國內外的不良反應。金聽後，「顯得不安和惱怒起來」。他態度強硬地說，就目前的局勢來說，應該執行對朴的死刑。他表示蘇聯檢察機關並沒有介入朴憲永案件的審理，有人去問蘇聯顧問的意見，那只是個人行為。對朴的審判沒有任何不妥，朝鮮人民一致贊成執行判決。如果蘇聯檢察機關有不同意見，勞動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將再行討論這個問題<sup>⑩</sup>。這件事情的結果尚無史料說明，但金這樣提出問題，很可能是擔心在社會和黨內思想如此動盪的情況下，朴會死灰復燃。當然，要想穩定局面，最重要的還是盡快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不僅解決思想問題，還要解決組織問題。

1956年4月23日，勞動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勞動黨三大)召開。金日成在大會上所作的中央工作總結報告洋洋萬言，基調如同以前的黨內文件，還是對成就濃墨重彩，對缺點輕描淡寫；黨的工作原則是集體領導，個人崇拜問題只發生在朴憲永身上，今後思想戰線的主要任務是批判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等等<sup>⑪</sup>。除了金日成的發言，所有報告人基本上都是「自吹自擂」，「報喜不報憂」<sup>⑫</sup>。整個大會沉浸在一片歌功頌德聲中，正如蘇共中央代表團團長勃列日涅夫(Л. И. Брежнев)在給莫斯科的報告中所說，會議的大部分發言都是誇誇其談，內容空洞，完全是華麗辭藻的堆砌。剛剛進入勞動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崔庸健和朴金喆在發言中高度評價勞動黨，明顯地暗示其成就高於蘇聯共產黨，還說朝共中央不僅沒有忽視集體領導的原則，而是相反，「成功地發揮了集體領導的作用」。教育相韓雪野的發言則「流露出民族主義腔調和對金日成個人崇拜的無限吹捧」<sup>⑬</sup>。

這樣眾口一詞，是因為會前已有充分準備。金本人及其支持者在多次會議和談話中給大會發言定了調子，統一口徑，對有不同意見的幹部則施加壓力，進行威脅。大會代表的所有發言稿，事先都必須經過中組部和中宣部的詳細審查，並不經作者同意進行任意修改。大會期間，駐蘇大使李相朝曾兩次給大會主席團遞條子，建議討論勞動黨內部的個人崇拜問題。副委員長金昌滿便找其談話，指責他在政治上太不成熟，崔庸健等人還以撤銷職務相威脅。在政治上頗感失意的朴昌玉準備在大會上發言，檢討自己的錯誤，但遭到拒絕，理由是不能在兄弟黨面前顯示勞動黨內部的分歧<sup>⑭</sup>。建設相金承化的發言稿也因審查沒有通過而退還本人<sup>⑮</sup>。大會期間，朝鮮報刊，首先是《勞動新聞》，對於轉載《真理報》(Правда)和《人民日報》批評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編輯部文章實行了嚴格限制<sup>⑯</sup>。

勞動黨三大及隨後召開的中央全會選舉了勞動黨新的中央機構和領導人：委員長金日成，副委員長崔庸健、朴正愛、朴金喆、鄭一龍、金昌滿，

常務委員會(原政治委員會)委員11人,即金日成、金料奉、崔庸健、朴正愛、金一、朴金喆、林海、崔昌益、鄭一龍、金光俠、南日;候補委員4人,即金昌滿、李鐘玉、李孝淳、朴義琬。與1948年3月第二屆中央最高領導機構相比,中央常務委員會已經完全是金日成的「家天下」了。11名常委中5人來自「游擊隊派」,其餘人員中朴正愛和南日早已加入金的派系,鄭一龍也有類似的名聲。只有「延安派」的金料奉和崔昌益在政治上比較獨立。候補常委中,李孝淳屬「游擊隊派」,李鐘玉是新提拔的技術官僚,金昌滿雖來自中國,卻是早已得到「金日成吹鼓手」的惡名,只有蘇籍朝鮮人朴義琬是中立人物。新中央委員會的人數變化不大,只增加了4人,共71人,但顯示了權力轉移的人員結構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原中央委員會中「游擊隊派」8人,除去世的金策和姜健外,全部保留,又新增加了5人(崔庸健、崔賢、李孝淳、俞京洙、李英鎬),共11人。原中央委員會裏蘇籍朝鮮幹部14人,只保留了4人(朴昌玉、方學世、金承化和韓一武),也新增5人(南日、崔宗學、許彬、朴義琬和金斗三),共9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方學世和南日已成為金的心腹。中央委員會中「延安派」幹部的人數變化不大,從原來的17人增加到18人,但替換率也很高,約50%。武亭、朴一禹、金雄、朴孝三等老幹部都被逐出中央委員會,而新補的中央委員,除了徐輝、尹公欽外,大多是1945年以後才提升上來的新幹部。在其餘的33名中央委員中,只有朴正愛、韓雪野和吳琪燮屬國內派老幹部(前二人早已歸順於金),還有7人具有南方背景,剩下的都是無名之輩或是純粹的新人<sup>20</sup>。總體看來,雖然表面上在中央委員會裏黨內原來各派幹部都有一定的比例,但實際上情況已發生很大變化。一則很多人是因為投靠了金,其職位才得以保留或升遷;二則大批得到提拔的新幹部無論其出身何處,都是在金的光環下成長起來的。

這個結果金日成當然非常滿意。大會結束以後,金突然改變了態度,開始安撫蘇籍朝鮮幹部。金親自或委託朴正愛等人找他們談話,徵求意見,並表示要改變對蘇籍朝鮮幹部的錯誤做法;與此同時,在安排內閣各省領導幹部的考慮中,有意把一些位置留給來自蘇聯的幹部。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穩定人心,讓他們安心工作。因為金了解到,勞動黨三大以後,包括內閣相和副相在內的很多蘇籍朝鮮幹部感到壓抑,心情抑鬱,無法開展工作,並紛紛要求回到蘇聯;加入了朝鮮國籍的人也頗為後悔<sup>21</sup>。另一方面,更重要是,金希望以此向莫斯科傳遞一個表示友好的信息,以平息蘇聯的不滿情緒。因為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轉向經濟建設,開始着手實行勞動黨三大提出的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1957-1961),而要開始這項工作,首先就需要蘇聯提供巨大的經濟技術援助。實際上,在大會結束後的第二天,金就率領主要領導成員拜訪勃列日涅夫,並進行了長達五個小時的會談。會談中,金明確表示勞動黨和政府打算再次請求蘇聯在經濟建設中給予援助<sup>22</sup>。至於訪問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時間就定在1956年的6至7月<sup>23</sup>。此時,一心謀求經濟援助的金可能忽略了一件事:黨內的政治鬥爭其實尚未結束。

## 二 反對派發起黨內政治鬥爭

在勞動黨三大的總結報告中，金日成信心滿滿地宣布，恢復和發展戰後國民經濟「三年計劃的全部任務一定會提前或超額完成」，並提出了「更加輝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與1956年相比，到計劃末年（1961）的工業產量增長目標是：鋼2至2.5倍，鋼材2.5至3倍，煤炭0.7倍以上，布匹0.5至1倍，發電量達到85億度，年度產量為化肥40萬噸，水泥100至150萬噸<sup>26</sup>。要實現這些宏大的目標，朝鮮只能再次求助於社會主義同盟國家，而在金的心目中，正如他在一次中央全會上談到的，朝鮮可能指望得到援助的國家只有三個，即蘇聯、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sup>27</sup>。1956年6月1日金率團出發訪問蘇聯及東歐等國後，6月8日，內閣副首相崔昌益向蘇聯大使伊萬諾夫表示，朝鮮政府代表團對訪問蘇聯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寄予厚望」，希望它們能給予朝鮮必要的援助<sup>28</sup>。但金此行必定要失望，因為他不了解，此時蘇聯和許多東歐國家都對朝鮮不滿，也沒有準備再像三年前那樣積極提供幫助。

早在1955年初蘇聯駐朝使館就注意到，在勞動黨通過的關於黨和國家現階段基本任務的指導性文件中，並沒有按照莫斯科的意見致力於和平統一，而仍然把「解放南朝鮮人民」和「消滅南朝鮮親美、親日地主集團」作為實現國家統一的途徑<sup>29</sup>。在1956年3月勞動黨為三大準備的黨章草案中，繼續反映出這種傾向，以至蘇聯使館不得不對此提出修改意見：刪除原文中「美國的」和「親美的」以及「從軍事上加強革命民主的基礎」等詞語，以免「授人以柄」，「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即朝鮮勞動黨為自己所確定的任務是帶有軍事性質的」<sup>30</sup>。

勃列日涅夫對金日成在勞動黨三大的報告很不滿意，他給蘇共中央的報告指出：關於蘇聯和其他國家對朝鮮的經濟援助，「報告中沒有任何具體內容談到這一點」<sup>31</sup>。伊萬諾夫也認為，該報告的「嚴重缺點在於隻字不提蘇聯、中國和社會主義陣營其他國家在戰後恢復和發展朝鮮國民經濟中給予的幫助，以及這些國家無償援助朝鮮人民所支付的大量資金」<sup>32</sup>。保加利亞駐朝大使戈利格洛夫（Григоров）抱怨說，朝鮮人從來不說實話，並在很多重大問題上對兄弟國家外交使團「嚴格保密」<sup>33</sup>。至於東德駐朝大使費舍爾（R. Fisher）在與蘇聯大使交談時說，朝鮮代表團打算向東德提出提供貸款和日用商品的要求，他擔心答應這些要求以後，朝鮮人又會提出「令雙方都不愉快的新問題」，況且他們自己現在還需要蘇聯的援助，再向朝鮮提供新的援助「是有一定難度的」<sup>34</sup>。

金日成這次出國，行走國家多（蘇聯、東歐及蒙古共九國），出訪時間長（6月1日至7月19日），但收效甚微。根據東德駐朝使館的報告，朝鮮代表團此行得到的援助包括：蘇聯提供3億盧布的無償物資援助，並將到期債務延長兩年償還；東德提供軋鋼機數台；羅馬尼亞無償提供價值2,500萬盧布的貨物，外加60輛拖拉機和10輛卡車；捷克斯洛伐克只答應將到期貸款的償還期延至1960年，並許諾盡快提供1954年已答應的5,000萬盧布的產品和設備；保加利亞同意追加3,000萬盧布的物質援助及其運費；匈牙利只保證750萬盧

布的無償援助；阿爾巴尼亞咬牙答應無償供給1萬噸瀝青；蒙古則援助8萬頭牛羊和5,000噸穀物<sup>38</sup>。除了牛羊和瀝青等實物沒有計價，以上八國向朝鮮真正提供的新的無償援助最多不超過4億盧布；波蘭沒有提供任何援助。這與恢復時期及三年計劃時期（1954-1956）蘇聯和東歐國家向朝鮮提供22億盧布的無償援助相比，差距甚大；與五年計劃的宏大目標相比，更是杯水車薪。實際上，蘇聯此時考慮給予朝鮮的，不是經濟上的援助，而是政治上的幫助。

對於勞動黨在三大前後的表現，蘇聯各機構都非常不滿，他們認為，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角度來說，不能再對勞動黨放任不管。還在勞動黨三大召開之前，蘇聯外交部情報委員會就向中央建議，「鑒於個人崇拜問題仍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佔有一定地位，我們認為，應當給予朝鮮勞動黨中央以幫助，以便其能夠運用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來建設朝鮮勞動黨的黨內生活」。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批示，將該報告分發蘇共中央主席團各委員審閱<sup>39</sup>。勃列日涅夫在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從勞動黨下發給各級黨組織的關於個人崇拜問題的秘密信件看，「朝鮮同志沒有理解蘇共二十大的決議」，他們的做法「對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是不能容許的」。鑒於「勞動黨工作中的嚴重錯誤和一系列缺點」，「我認為當金日成同志在莫斯科的時候必須要他對此予以重視」<sup>40</sup>。在金日成代表團出國訪問前，伊萬諾夫的報告又提出，針對勞動黨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建議在莫斯科就上述問題與他〔金日成〕進行對等級別的會談」<sup>41</sup>。

關於蘇聯領導人在莫斯科與金日成會談的詳細情況，俄國的有關檔案尚未解密<sup>42</sup>。不過，從一些間接材料來看，可以確認此事的確存在。金這次乘火車出訪，1956年6月4日到達莫斯科，幾天後去東歐數國，7月6日又返回蘇聯，直到12日離開莫斯科。在此期間，6月19日，蘇聯副外長庫爾久科夫（И. Ф. Курдюков）接見了李相朝大使，並向他轉交了接待朝鮮代表團的計劃草案。在會談中李相朝提出，如果這次兩國領導人會談除經濟問題外，還有黨和政治方面的內容，他建議應該讓代表團中的勞動黨黨員都參與討論，以便使更多的朝鮮領導人了解蘇聯的建議和意見，而這一點對幫助金改正錯誤十分重要<sup>43</sup>。此外，9月10日李相朝與蘇共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Б. Н. Пономарев）談話時透露，蘇共中央在7月曾與金日成、朴正愛、南日舉行會談<sup>44</sup>。9月18日米高揚在北京與毛澤東會談時提到，金在莫斯科的時候，蘇共中央領導人與他談過一次話，蘇共中央聯絡部也同他討論了一些具體問題。波諾馬廖夫插話說，金當時表示接受我們的意見和批評，將在今後工作中改正錯誤<sup>45</sup>。還有，1960年5月21日金訪問北京時對毛說，他在莫斯科的時候，赫魯曉夫向他提出了三個問題：在朝鮮沒有傳達蘇共二十大決議；黨的書記和首相應該分開（擔任）；处理好與蘇籍朝鮮幹部的團結<sup>46</sup>。這些材料儘管零散、粗略，但由此可以判斷，蘇聯領導人（很可能就是赫魯曉夫本人）與金進行了會談，並對他提出批評，而金表示接受蘇共的意見，時間應在1956年7月上旬。這次會談，特別是其消息的洩露，對於朝鮮黨內政治鬥爭的重啟，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金日成悻悻然回國，卻遇到了更麻煩的事情——黨內反對派正在醞釀一場直接針對他的領導地位的風暴。金一定會想到黨內有人對他不滿，也可能

會估計到有人在暗中反對他，但沒有想到的是誰會站出來挑戰他。從1954年底到1956年初黨內的鬥爭情況來看，基本上針對他的都是蘇籍朝鮮幹部，因為那時「南方派」已不復存在，「延安派」的實力人物也早已離開權力中心，而金料奉只是一個不問世事的象徵性代表，所以此時如果有人跳出來，應該是「蘇聯派」的幹部，而蘇共二十大的衝擊恰好就是他們的動力<sup>44</sup>。但金萬萬沒有想到，最初出來活動的竟是原來「延安派」的幹部，而且是他在打擊蘇籍朝鮮幹部時利用過的人——崔昌益。

崔昌益是「延安派」的元老，1946年8月北朝鮮勞動黨成立時就是政治委員會委員，1948年9月朝鮮政府成立時又擔任財政部部長，後升任內閣副首相，在勞動黨三大新選的中央常委中排名第八。從崔在黨內地位穩中有升的情況來看，應該是得到金日成賞識的，特別是他又在批判蘇籍朝鮮幹部的運動中為金立下汗馬功勞<sup>45</sup>。金與崔的矛盾起於何時，現在看不到相關的史料記述，俄國檔案中唯一的記載是，勞動黨三大之後，在1956年5月29日的中央常委會議上，金對崔有一番評議，使他感到遭受了侮辱。崔對朴義琬傾訴說，他無論如何不能忍受現在的處境，與其在黨內擁有一定地位，但內心深處卻感到自己是不被需要的人，還不如去死<sup>46</sup>。根據現有的材料判斷，金與崔產生矛盾，很可能是由於金過河拆橋——因為去蘇聯訪問前要做出對蘇籍朝鮮幹部的友好姿態，遂把崔推出來當替罪羊。

1956年6月，金日成按計劃出訪蘇聯、東歐和蒙古，他剛一離開平壤，6月5日，崔昌益就來到蘇聯使館。在與伊萬諾夫的談話中，崔吞吞吐吐地表示，希望蘇聯領導人在與金日成會談時能涉及黨和政府領導的政治問題，因為關於朝鮮的集體領導制是否得到了充分發展，目前是有不同看法的。伊萬諾夫看出崔有話要說，約他6月8日再到自己住所見面<sup>47</sup>。6月7日，崔通過金承化告訴伊萬諾夫，會談期間不要有翻譯在場，只有金承化可以參加<sup>48</sup>。在6月8日的單獨會見中，崔詳細講述了他對朝鮮黨和國家領導層出現不健康情況的看法：領導幹部的選拔和任命存在着任人唯親的路線和派別之爭；黨的領導者（顯然是指金日成）不願承擔責任，把一切組織工作的過失都推給許嘉誼；對蘇籍朝鮮幹部許嘉誼、朴昌玉的批判和鬥爭是不公正的；現在中央常委會的幹部大多是素質低下、經驗不足、阿諛奉承之輩；黨內不能正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在黨的會議上不能暢所欲言；朝鮮領導人從來不提蘇聯在解放朝鮮中的作用，以批判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作掩護取消蘇聯文化，等等。最後，崔希望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能向金提出必要的建議<sup>49</sup>。這顯然是一種試探。幾乎所有朝鮮幹部都知道，只有蘇聯的意見才能促使金改正錯誤，沒有莫斯科的表態，所有對金的批評都無濟於事。

由於不了解莫斯科的態度，反對派沒有採取進一步行動，平壤依然平靜如水。此時，莫斯科召伊萬諾夫回國（很可能就是商議蘇聯領導人與金日成會晤一事）。臨走前，伊萬諾夫於6月19日特意拜訪了正在朝鮮主持工作的崔庸健，詢問有何事情向朝鮮代表團轉達。崔回答，這段時間沒有發生任何重大事情，一切都按照金出國前夕的指示在進行<sup>50</sup>。如果上述關於7月上旬蘇聯領導人會見並批評金的判斷正確，那麼接下來的合理推論就是，李相朝把這個

消息傳遞給了在朝鮮境內的老戰友，於是，反對派幹部在7月中旬採取了進一步更為明確的政治行動。

根據一份十分重要但尚有爭議的俄國解密檔案記載，1956年7月14日，朝鮮建築材料局局長李弼奎來到蘇聯使館。李也是「延安派」老幹部，他自我介紹說，十六歲參加中國革命，回到朝鮮後在蘇聯民政府負責安全部門工作。1948至1950年在蘇共中央下屬黨校學習，回國後曾任人民軍副總參謀長、內務省第一副相。因同朴一禹關係密切，受其牽連，調離內務省，改任化學省副相，後貶為建材局局長。因伊萬諾夫已回國，彼得羅夫(A. M. Петров)作為代辦接待了李。在一個半小時的談話中，李滔滔不絕，並直接把矛頭對準金日成。他直言不諱地表示「無法容忍」對金個人崇拜的種種現象，其結果就是黨中央和內閣集結了一批專會給金拍馬屁的齷齪小人，十八名內閣相中有一半人存在歷史污點。李透露，現已有一批幹部組織起來，認為有必要盡早對金及其親信採取某些行動，目的是更換現在的黨中央和政府領導層。行動的方式有兩種：或者在黨內開展尖銳而果斷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估計金不會接受；或者強行改變政治格局——估計將會付出犧牲。目前這些幹部正在進行準備。儘管迴避了彼得羅夫關於這個組織有哪些成員的問題，李還是談到了他對一些幹部的看法，從中大體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崔庸健——最近表現出對金的作為不滿意；崔昌益——有豐富的革命經歷，如果鬥爭開始，他會站在金的對立面；金料奉——安於現狀，但不會盲目追隨金；朴昌玉——過去曾是金個人崇拜的始作俑者，現在想要彌補自己的過失；朴義琬——是個好人，在領導幹部中享有威望。其他人如金一、朴正愛、朴金喆、金昌滿、韓雪野，不是壞人，就是小人，或者根本不值一提。最後，李要求對談話內容嚴格保密<sup>⑩</sup>。

對於這份日期標記為7月20日的打印稿文件，俄羅斯著名朝鮮問題專家蘭科夫(Andrei Lankov)依據他所發現的該文件手寫記錄稿及彼得羅夫後來向伊萬諾夫的匯報進行了仔細考證，並發現一些重要問題。首先是時間不對。手寫記錄稿形成的時間是7月14日，即談話是在這一天進行的，但打印稿改為7月20日。其次是內容有出入。打印稿刪去了手寫記錄稿中李弼奎抨擊金日成的最嚴厲的詞句，還刪去了有關李相朝反對個人崇拜及其與李弼奎關係密切的內容，但添加了手寫記錄稿中沒有的內容，即關於有一個反對派組織存在的內容。最後是彼得羅夫向伊萬諾夫匯報時又談到了打印稿和手寫記錄稿中都沒有記載的新內容，即李弼奎曾談到，如果朝鮮領導層的更迭不能和平實現，他們將轉入地下鬥爭，並會得到革命者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支持<sup>⑪</sup>。筆者手裏只有該文件的打印稿，沒有看過另兩件檔案文件，但只要這兩件文件確實存在，蘭科夫的考證應該是可信的。

根據上述文件可以作出如下判斷：第一，蘇聯領導人在莫斯科批評金日成的消息是李相朝傳遞給其在朝鮮的親密戰友的，這個消息對崔昌益、李弼奎乃至朴昌玉等反對派幹部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反對派很可能是此時開始相互聯繫的）；第二，這些幹部討論了對金日成及其親信展開政治鬥爭的問題，即首先按正常程序或常規做法開展批評和自我評判，否則考慮採取某種強硬的政治行動（應該是指在會議上強行提出批評），但無法認定他們是否已經建立

了一個組織(相信可能性不大);第三,反對派的主要目標是更換朝鮮黨和政府的領導層,甚至包括金本人,而理由就集中在個人崇拜問題上(這是金的軟肋,也最能夠打動蘇聯人);第四,反對派認為所採取的行動必須也很可能得到蘇聯的進一步支持,所以才再次到使館匯報(為說服蘇聯人,談話非常直率,但也有些誇大其詞);第五,此時考慮準備「採取行動」的反對派核心人物,從談話人的語氣看,李弼奎本人應該是其中之一(彼得羅夫也是這樣判斷的),而金科奉、崔昌益只是可依靠對象,崔庸健和朴昌玉則是可爭取對象(對早已投靠金日成的崔庸健的判斷明顯失誤,其原因可能是落花有心,流水無意,也可能是有意誇大,以壯聲勢);第六,關於彼得羅夫修改文件的原因,因未看到原件,還不好說。合理推斷應該是彼得羅夫的個人問題,或者如蘭科夫猜測的,與蘇聯使館內部矛盾有關<sup>⑤</sup>。至於談話中所說轉入地下鬥爭並取得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支持,顯然是反對派的一廂情願。

此外,還有兩點需要補充。筆者曾採訪時任勞動黨平壤市委組織部部長的金忠植,他是在朝鮮國內成長起來的年輕幹部,1956年也參與了對金日成的批判,「八月事件」後逃到中國。他談到了兩個情況:第一,黨內對金日成的不滿情緒非常普遍,金出訪後一些幹部商議,準備在8月即將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批判金,組織者是職業聯盟委員長徐輝,他得到了崔庸健的支持和金科奉的贊同;第二,同年6月28日波蘭爆發的波茲南工人罷工的消息傳到朝鮮後,產生了很大影響,平壤有幾萬對黨的政策不滿的工人也要組織罷工,並得到平壤市委副委員長洪淳寬的支持,五名市委常委中有四人同情工人<sup>⑥</sup>。由此判斷,徐輝應該是反對派的主要組織者,這一點從後來發生的事情可以證明。而據伊萬諾夫報告,「波茲南事件」的確「進一步加強了對朝鮮勞動黨領導人的不滿情緒」<sup>⑦</sup>。

就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金日成回國了。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裏,勞動黨內便展開了一場充滿血雨腥風的激烈鬥爭。

### 註釋

① 由於版面篇幅限制,「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按時間順序分為五個專題六篇文章:「在黨內排除異己」,「八月事件」(序曲、正劇),「應對中蘇共同干預」,「毛澤東轉變對朝方針」,「志願軍撤離北朝鮮」。第一篇已經刊出,參見沈志華:〈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在黨內排除異己〉,《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5年10月號,頁68-85。其餘將在《二十一世紀》陸續刊出。

② 筆者對以上敘述的詳細論證,參見沈志華:《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1945-1959)》,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第六章。

③ 關於朝鮮黨內各派幹部、金日成大學學者及社會知識份子的反應,可參見大量的俄國檔案文獻及當事人回憶錄,如黃長燁:《我所看見的歷史真理——黃長燁回憶錄》(首爾:宇宙出版社,1999),頁105-11;Капица М. 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 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 Москва: 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 1996, с.236。

④ 詳見沈志華:〈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在黨內排除異己〉,頁68-85。

⑤ 菲拉托夫(С. Н. Филатов)與朴義琬談話紀要,1956年1月24日,РГАНИ(俄羅斯國家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2, л.66-69。

- ⑥ 參見〈55個兄弟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團列席蘇共代表大會〉，《人民日報》，1956年2月17日，第4版。
- ⑦ 參見〈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人民日報》，1956年2月18日，第2-8版；〈米高揚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人民日報》，1956年2月22日，第5版。
- ⑧ 參見〈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勞動新聞》，1956年2月16日，第3版；2月23日，第2-7版；2月24日，第3-4版；〈米高揚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勞動新聞》，1956年2月25日，第3版。蘇聯使館後來也得到了有關報告，並確認反映的情況屬實。參見菲拉托夫與金承化談話紀要，1956年3月5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2, л.128-32。
- ⑨ 魯緬采夫(С. Румянцев)給波諾馬廖夫(Б. Н. Пономарев)的報告，1956年4月5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57-67；伊萬諾夫(В. И. Иванов)日記，1956年3月21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1, л.165-68。
- ⑩ 朝鮮勞動黨中央全會關於崔庸健所作報告的決議，1956年3月20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1, л.181-82。
- ⑪ 比亞科夫(И. С. Бяков)與鄭律談話紀要，1956年4月5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126-28；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4月13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119-21。
- ⑫ 伊萬諾夫致費德林(Н. Т. Федоренко)電，1956年4月18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140-62。
- ⑬ 勃列日涅夫(Л. И. Брежнев)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年4月，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5446, оп.98, д.721, л.212-19；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4月14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121-22。
- ⑭ 菲拉托夫與金承化談話紀要，1956年5月24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2, л.207-11；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5月29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191-93。
- ⑮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4月19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2, л.214-16。
- ⑯⑰ 參見金日成：〈在朝鮮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中央委員會工作總結報告〉，載《金日成著作集》，第十卷(平壤：外國文出版社，1982)，頁147-256；179-91。
- ⑱⑲⑳㉑ 伊萬諾夫關於朝鮮勞動黨三大的報告，1956年5月19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1, л.143-59。
- ㉒⑳㉓㉔ 勃列日涅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年4月，АВП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212-19。
- ㉕ 徐輝等人致中共中央函，1956年9月5日，АВП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161-81；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5月18日、薩姆索諾夫(Г. Е. Самсонов)與奇石福談話紀要，1956年5月31日、李相朝致朝鮮勞動黨中央函，1956年10月5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173-75、199-223、233-95。
- ㉖ 菲拉托夫與金承化談話紀要，1956年5月24日。
- ㉗ 參見《朝鮮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彙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頁197-99；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The Failure of De-Stalinization, 195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68-72。值得注意的是，勃列日涅夫向蘇共中央匯報時說，勞動黨中央常委會減少了蘇籍朝鮮人，卻極大提高了來自中國的朝鮮人的比例，即在15名常委和候補常委中，來自蘇聯的只有3人，而出身於中國的有10人。參見勃列日涅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年4月，АВП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218。勃列日涅夫顯然沒有弄清楚這些朝鮮人的經歷，但這個結論可能會影響到蘇共中央後來處理朝鮮問題時的心態。
- ㉘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5月7、10、18、19、30日，6月5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2, л.222-29；д.410, л.173-79、193-94、203-206；菲拉托夫與金承化談話紀要，1956年5月24日；菲拉托夫與金達一談話紀要，1956年5月26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2, л.204-206。

- ②⑤ 伊萬諾夫關於朝鮮勞動黨三大的報告，1956年5月19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1, л.158-59。
- ②⑦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5月18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176。
- ②⑧②⑨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6月8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210-14。
- ②⑨ 庫爾久科夫(И. Ф. Курдюков)致波諾馬廖夫(Б. Н. Пономарев)函，1955年4月6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314, л.12-15。
- ③⑩ 蘇茲達列夫(С. П. Суздаев)致謝爾巴科夫(Л. А. Шербаков)函，1956年3月5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22-25。
- ③③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5月23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186-87。
- ③④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5月27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189-91。
- ③⑤ 東德駐朝使館的報告：關於兄弟國家的經濟援助，1956年9月8日，РА АА, МfА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交部政治檔案館)，А 7.013, Вl. 3-11。金日成提到的數字與此大體相同，只是還提到蘇聯減免了5.7億盧布的舊債。參見金日成在中央全會的報告，1956年8月30日，АВП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69-103。此外，經過反覆商談，東德同意從以前援建的剩餘資金中撥出1,800萬盧布作為新的無償援助。參見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8月20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52-54。
- ③⑥ 魯緬采夫給波諾馬廖夫的報告，1956年4月5日。
- ③⑨ 從蘇朝發表的聯合公報中，看不出雙方曾討論黨內和政治問題的任何迹象。參見 *Правда* (《真理報》)，13 июля 1956 г., 1-й стр.。
- ④⑩ 庫爾久科夫與李相朝談話紀要，1956年6月16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2, л.238-41。
- ④⑪ 波諾馬廖夫與李相朝談話紀要，1956年9月10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228-32。
- ④⑫ 毛澤東接見蘇共中央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9月18日，未刊。
- ④⑬ 毛澤東與金日成會談記錄，1960年5月21日，未刊。
- ④⑭ 勞動黨三大開會前，金日成和崔庸健就提出，蘇籍朝鮮幹部既接受朝鮮國籍，又不願放棄蘇聯國籍，這種「腳踩兩隻船」的人怎能選為中央委員？而對「延安派」幹部則顯得十分寬容，金甚至主動提出釋放朴一禹的問題，對李相朝在大會上提出要討論個人崇拜問題的做法，也沒有深究。參見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5月10日、18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2, л.227-29、д.410, л.174-77；薩姆索諾夫與奇石福談話紀要，1956年5月31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222-23。
- ④⑮ 崔昌益參與對「蘇聯派」的鬥爭，很多蘇籍朝鮮幹部都向蘇聯使館反映過，甚至蘇聯外交部也認可這種說法。參見菲拉托夫與朴義琬、朴永彬、金承化談話紀要，1956年1月24日、2月25日、3月5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2, л.66-69、75-83、128-32；魯緬采夫給波諾馬廖夫的報告，1956年4月5日。
- ④⑯⑰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6月5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203-206。
- ④⑱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6月7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210。
- ④⑳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6月19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2, л.265-67。
- ⑤① 彼得羅夫(А. М. Петров)與李弼奎談話紀要，1956年7月20日〔14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04-308。參見 *CWIHP Bulletin*, issue 16 (Fall 2007/Winter 2008): 478-80。
- ⑤②⑤③ 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79-83; 108-10.
- ⑤④ 筆者採訪金忠植記錄，太原，2010年2月17日。
- ⑤⑤ 伊萬諾夫關於朝鮮勞動黨「八月事件」及目前局勢的報告，1956年12月28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86, л.1-17。